

社会全面智能化，教育何为？

王竹立 吴彦茹 王永军 杨丽勤 王永平

(山西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山西太原 030031)

[摘要] 社会全面智能化正一步步从设想走向现实。本文通过厘清“社会全面智能化”的内涵与现实特征,梳理学界对人工智能社会风险的研究进展,指出当前研究多聚焦经济社会层面,缺少教育视角的风险应对思考;针对传统教育体系面对智能化浪潮的不适应性,重新思考智能时代教育应承担的使命,提出教育需要跳出“谋生至上”的逻辑,转向促进人的全面、完整发展,发挥弥合技术鸿沟、缓和阶层分化、引导个体妥善应对被动闲暇与精神困境等作用;倡导树立大教育观念,构建新型终身教育体系,充分挖掘各类社会公共资源的教育价值。文章还探讨了教育转型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核心挑战,并从课程评价改革、社会化学习制度建设、社会配套机制完善等方面给出可行对策,以期为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变革提供参考。

[关键词] 全面智能化;教育使命;人的两极分化;人工智能社会风险;公共教育资源

[中图分类号] G40-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2179(2026)05-0017-08

一、何谓社会全面智能化？

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数字技术正推动人类社会从局部数字化走向全面智能化(喻国明等,2023)。所谓社会全面智能化,不是指某款智能产品的简单应用,也不等同于人们常说的数字化、信息化。它描述的是一种社会状态:人工智能深度渗入生产劳动、社会治理、日常生活、文化消费等,甚至影响人的精神世界,技术不再只是工具,而逐步成为社会运行的底层逻辑。全面智能化是数字社会发展到更高阶段的产物,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人工智能深度介入劳动分工,劳动形态发生结构性改变。不光是流水线体力劳动被机器取代,文案撰写、数据分析、方案设计等过去依靠脑力完成的工作,很大一部分也可交给人工智能处理。那些单纯依靠记忆知识、重复熟练技能的劳动者受冲击明显。社会生产力的空前释放,并不意味着一定会转化为全社会共同的主动闲暇;社会更可能走向两极分化:部分劳动者遭遇岗位挤压而被动空闲,而从事人机协同、创意决策类岗位的群体,工作边界被技术打破,劳动负担反而加重。产业结构的重构,向教育提出新的命题:不能仅聚焦培养

[收稿日期] 2026-09-07

[修回日期] 2026-09-10

[DOI编码] 10.13966/j.cnki.kfjyyj.2026.05.002

[基金项目] 山西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4年度规划课题“教育强省背景下数字化赋能山西省乡村薄弱学校高质量发展研究”(GH-240022),2024年山西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创新项目“AI-TPACK视角下师范生教学技能培养研究”(J20240737),2023年山西省本科教学改革创新项目:“基于多模态数据的高校课堂教学行为诊断与改进研究——以山西师范大学为例(J20230577)。”

[作者简介] 王竹立,特聘教授,山西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研究方向:数智时代的学习、创新思维与创新教育;吴彦茹,硕士,副教授,山西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研究方向: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王永军,博士,副教授,山西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研究方向:中小学数智化应用;杨丽勤,博士,副教授,山西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研究方向: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王永平,副教授,山西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研究方向:人工智能教育。

[引用信息] 王竹立,吴彦茹,王永军,杨丽勤,王永平(2026). 社会全面智能化,教育何为?[J]. 开放教育研究,32(5):17-24.

就业能力, 还需回应个体处境变化带来的发展难题。

第二, 智能技术深度嵌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获取信息、与人交往、休闲娱乐、消费出行、办理公共事务, 都离不开智能系统。算法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接收什么信息、形成怎样的审美偏好、养成怎样的思维习惯。技术不再只是工具, 已变成人生存环境的一部分。

第三, 智能系统参与公共决策和社会资源调配。城市治理、公共服务供给、资源分配越来越多地借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智能系统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参与者, 但社会公平的方式和路径, 也被工具理性深刻重塑。

第四, 人机协同成为人立足社会、谋求发展的基本方式。人的能力强弱, 不再只取决于天生的禀赋、后天的勤奋, 很大程度上要看他(或她)是否善于和人工智能协同工作。懂得及善用人工智能的人, 可借工具放大自身的能力; 缺少相应技术素养, 驾驭不了智能工具的人, 可能很容易在社会竞争中落下风。社会两极分化逐步形成。

必须指出的是, 本文所提的“社会全面智能化”, 一部分正在发生, 另一部分还只是未来趋势。社会全面智能化不等于将社会完全交给人工智能。人的价值判断、自主选择依旧举足轻重, 只是技术对社会的影响力被提升到新的高度。现阶段, 人工智能依旧存在幻觉和价值偏见, 远不能取代人类, 但技术发展的方向已十分清晰, 这要求我们提前预判随之而来的各类风险和矛盾, 尤其是岗位替代带来的被动闲暇、价值失落等风险。

二、可能带来哪些风险?

社会智能化在解放社会生产力、重塑产业形态的同时, 也可能催生技术性失业、就业结构极化、收入分配失衡、数字不平等和社会阶层固化等系统性社会风险。

(一) 技术性替代引发结构性失业与就业摩擦

早在 1930 年, 凯恩斯就提出“技术性失业”理论, 预判机械化进程将持续替代传统劳动力, 为后世研究人工智能的就业替代奠定了理论根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2016)。智能化相较于传统工业技术展现出更强的穿透性, 不再局限于体力劳动替代, 还逐步延伸至常规脑力工作领域。世界银行

(World Bank, 2026)的研究证实: 流程化、范式化的任务是智能技术替代的核心领域。

智能化技术在淘汰传统岗位的同时, 也会通过产业升级、需求溢出, 催生新型就业形态, 但劳动力技能迭代、跨行业流转存在显著的调整周期, 短期就业冲击不可避免, 劳动力市场难以自发实现均衡修复(Autor et al., 2019)。生成式人工智能加速了劳动者技能迭代节奏, 现行人才培养体系更新滞后于技术演进速度, 人岗错配矛盾持续加剧(鲍春雷, 2026)。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研究发现, 人工智能冲击就业的岗位以内容改造为主、职业整体消亡为辅(张丹丹等, 2025)。虽然人工智能产业化仍处于发展期, 但标准化岗位的用人需求收缩趋势已初步显现(陈青, 2026)。

(二) 就业极化加剧收入分化与社会不平等

现有研究证实, 智能化进程推动劳动力市场呈“两端扩张、中间塌陷”的沙漏形态: 高创新性、高决策性的高端岗位凭借不可替代性持续升值, 基础实操类低端岗位得以保留, 依附标准化流程的中等脑力劳动岗位则持续被挤压, 形成中产岗位空心化的就业分布现象。

在收入分配层面, 人工智能具备显著的资本偏向与高技能偏向特征, 大幅提升了资本回报率与高端人才技能溢价, 拉大了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陈斌开等, 2026; 刘红英等, 202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2025)的研究指出, 人工智能虽可能缩小普通劳动群体的薪资差距, 却会显著放大财富层级的不平等, 资本持有者独享技术发展的超额红利, 贫富分化问题持续加剧。若无制度与社会机制的干预调节, 中等收入群体难以有效扩容, 技术赋能带来的阶层分化效应将持续固化(蔡昉, 2025)。智能时代的阶层分化逻辑已发生本质转变, 技术驾驭能力逐步超越学历、工作年限等传统评价指标, 成为决定个体社会阶层归属的核心变量(齐天骄, 2026)。

(三) 智能鸿沟迭代升级引发个体发展失衡风险

传统数字鸿沟聚焦网络设备、智能硬件的接入差异, 全面智能化时代的数字不平等的核心体现为个体智能应用能力的差距(钟祥铭等, 2022)。智能时代的发展壁垒不再是硬件设备的可获得性, 而

是个体对智能技术的认知、信任和实际应用素养, 素养差距直接转化为个体发展差距(喻国明等, 2024)。地域、学历、年龄等基础条件, 会持续拉大个体的智能技术适配能力, 最终固化个体发展差异(胡开朗等, 2026)。

(四) 价值消解催生精神空虚与阶层对立的深层社会风险

相较于经济与就业层面的显性风险, 智能化带来的个体精神危机与社会阶层二元对立, 是更深层的风险。在工业时代, 个体价值的体现主要依托物质生产与财富创造, 谋生劳动是个体参与社会、实现自我价值的核心载体。进入全面智能化时代, 基础性生产劳动被人工智能替代, 社会物质财富极大充裕, 不少人面临劳动机会减少、被动闲暇增多的生存困境, 这极易引发个体精神空虚、价值迷失、社会参与意愿弱化等危机。

尤瓦尔·赫拉利(2017)的阶层演化理论揭示了智能化时代的社会风险: 人工智能、大数据与生物技术融合发展, 彻底颠覆传统社会阶层结构, 导致形成“智神精英阶层”与“无用阶层”的二元对立格局。掌握核心数据、智能算法、前沿技术与社会资本的精英群体, 持续依托技术突破人类生理与智力边界, 实现个体能力的全方位迭代升级。普通人因常规劳动价值被机器替代, 即便能依托社会保障维持物质生存, 却因劳动价值消解陷入精神迷茫与自我意义缺失的困境, 最终可能沦为脱离社会核心生产体系的“无用阶层”。这种技术能力带来的阶层分化, 不再是简单的财富差距, 而是近乎物种层级的根本性差异, 极易引发社会割裂与价值对立。新型人文价值观的缺失, 会放大精英群体的物质贪欲与权力崇拜, 加剧社会阶层的对立与撕裂。

综上所述, 现有研究多集中于经济学、社会学领域, 较少立足教育视角探索风险化解路径, 忽视教育作为社会平衡器、风险缓冲器的功能, 未能构建“技术风险—教育调适”的治理逻辑。当前, 教育改革研究局限于校园内部教学革新, 脱离宏观社会风险语境; 数字教育资源研究聚焦硬件设施建设, 忽视教育在弥合智能鸿沟、平衡阶层差距、赋能全民终身发展中的核心价值。因此, 本研究旨在探讨如何通过调整育人目标、优化培养体系、树立大教育观, 推动个体将被动闲暇转化为发展资源, 从而

化解智能时代个体面临的精神危机与意义困境。

三、教育如何应对?

(一) 传统教育体系面对智能化的不适应性

传统教育成型于工业化时代, 核心思路是批量培养标准化人才。它通过讲授系统知识、训练职业技能, 为工业生产、普通服务业输送具备生产能力的劳动者。长期以来, 背诵记忆、公式演算、流程操作、复刻专业技能是教育考核的重点。学生学习目标也重在积累书本知识, 学好对应岗位技能, 实现自身劳动价值。

智能化社会的教育主要矛盾开始改变。人工智能可以快速完成重复性脑力劳动。真正属于人的核心素养, 是独立创新、批判性思维、共情能力、审美创造、价值思辨与终身学习能力。传统教育解决的是“如何教会人劳动”, 回答不了智能时代“如何让人拥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如果教育不能帮助人建立起人工智能难以企及的核心特质, 不能推动人成长为创造性、价值性主体, 将很难缓解个体价值失落难题, 也难以化解智能化带来的阶层分化风险。

传统社会当中, 学校是核心的教育主体, 家庭和社会起辅助作用。这套模式适合工业时代的人才培养。进入智能时代, 人的发展需求变得多元、终身、个性化。人的成长不只是青少年时期积累知识技能, 更需一辈子持续塑造人格、提升素养、安顿内心、调整生存方式。一方面, 技术推动社会快速发展, 人需要持续学习更新认知。另一方面, 智能化带来的危机不只是失业, 更是价值层面、精神层面的失落。这就意味着, 教育不能只服务于就业, 还要做好心理滋养、价值引导、人格塑造, 帮人找到生命的意义。

(二) 全面智能化时代教育的核心目标重构

1. 从“谋生教育”走向“人的完整发展教育”

自工业时代以来, 教育就带有浓厚的工具色彩, 本质上是服务生产的“谋生教育”。教育的意义被简化为学知识、练本事、找工作、谋生存。当人工智能可完成大量常规工作时, 单纯以就业谋生为导向的教育就不再适用。智能时代教育变革的重要一步, 就是挣脱过度功利的工具束缚, 回归教育本身, 追求人的完整发展。“人的完整发展教育”

是以人为目的的教育,它不把人当作工具与生产要素,不把教育窄化为培训谋生技能,而指向人的身心协调和知情意行统一,最终实现德性与社会性的整体生长,让受教育者成为人格完整、精神丰盈、能自我实现且能承担公共责任的人。这里的完整发展,强调克服技术带来的人的工具性异化,重视个体主体性、生命意义与精神世界的建构,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思想增添智能时代的新内涵。

智能时代的教育要调整育人重心,着力培育专属于人的素养:首先要唤醒人的主体性,让人学会独立思考、主动探索、自主选择,不被算法和数据牵着走;其次要保护与激发创造力,鼓励跨界思考、大胆想象、个性化表达,培养机器复制不出来的原创思维,同时培养共情、审美、价值判断力。同理心有助于维系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结,是人工智能模拟不了的人性温度;审美让人懂得感受生活、创造美好、丰盈内心;价值判断帮助人在信息繁杂、算法泛滥的环境下明辨是非,守住立场,不盲目跟风。这一系列素养的培育,可帮助人建立稳固的生命意义感,实现完整、长久的成长,不因劳动岗位消失而否定自我。

教育还需要承担起重塑价值认知的使命,打破“劳动等于价值,职业等于人生”的单一思维,引导人们相信:人的价值不全部取决于工作岗位,也不完全在于可量化的劳动贡献。人的善良共情、热爱生活、审美体验、精神成长,本身就是珍贵的价值,无法被算法量化,更不能被机器替代。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应聚焦于提升个体生活品质与构建社会美好生活,人的价值重心要由传统的物质劳动转向精神发展与人文创造。这种智能时代所需的新型人文价值观的建构,能帮助大众摆脱功利化的生存桎梏,实现个体精神的丰盈与生活品质的提升;消解科技与资本对物质财富的无限追逐和对社会控制权的过度崇拜,从根源上化解技术带来的阶层对立隐患,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均衡发展。

2. 承担消解两极分化的社会功能

智能化潜藏着一大社会风险:技术资本精英与普通大众的两极对立。智能化社会需要科技与资本精英,从事科技的风险投资、研发、迭代维护、伦理治理、科普等工作,但精英注定只能是少数。在这样的背景下,教育不能只是个人成才的途径,

更是维护社会公平、缓和阶层撕裂、平衡技术鸿沟的重要手段。未来社会的阶层差距,很大程度上是技术认知与工具使用能力的差距。少数精英掌握人工智能底层技术、算法逻辑与数据资源;普通民众缺少智能素养,难以适应智能生活,慢慢被时代边缘化,成为新一代“技术文盲”,社会鸿沟由此逐步成形。

这就要求社会必须向所有人开展普惠性人工智能素养教育,打破技术和信息的垄断,包括在基础教育阶段普及通识人工智能,让每个孩子都能认识智能技术的优势与风险,掌握使用方法,能借助人工智能发展自我;高等教育机构应面向社会大众开展数字素养、智能思维等培训,并依托终身教育体系惠及广大民众,抹平家庭经济条件带来的技术认知差距,从源头缩小技术鸿沟,降低智能化带来的阶层撕裂风险。

教育也要处理好一组现实命题:既要培养拔尖科技人才,又要面向普通大众开展生命教育,引导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提升幸福感;既要承认人与人之间的能力差异,又不能让技术能力变为阶层壁垒,而应畅通精英和普通大众之间的流动通道,消除不同阶层隔绝分化的局面。

3. 教育要引导个体善用富余时间

社会全面智能化最可能带来时间的两极分化:部分人被动拥有大量闲暇时间,少数群体持续承受高强度工作压力。未来人类突出的困境,未必是过度劳累,更可能是被动无事可做带来的精神荒芜。因此,教育需要发展新的功能:教会人积极面对被动闲暇,把闲暇转变为自我成长、提升生命境界的契机。

工业化教育的重点是教人如何高效完成工作,很少教人如何享有闲暇,尤其缺少对“非自愿闲暇处境”的引导。今天,被动闲暇已成为部分人不得不接受的现实,教育由此需要教人享受闲暇,包括发展自我规划与自律能力,学会自主分配时间,确立成长目标,远离无效消遣,把被动的闲暇转化为自我提升的机会,比如树立终身学习意识,利用闲暇时间更新知识,跟上技术快速变化;培养兴趣爱好、审美特长,在空余时间读书,开展艺术创作,参与文体和社会公益活动,从而滋养内心,构建充实积极的精神世界。

(三) 充分发挥社会公共资源的教育功能

智能时代, 学校教育很难完成人终身成长、精神塑造的全部任务。教育的场域、参与主体、学习内容需跳出封闭的校园。激活全社会公共教育资源, 打造覆盖全域、贯穿一生、多方参与的社会化育人体系, 是智能时代教育变革的必由之路。

1. 突破“只有学校才是教育”的狭隘认知, 倡导大教育观

长久以来, 社会有种固化看法: 教育等于学校教育, 学习等于上课。智能化时代需要树立大教育观。所谓大教育观, 就是打破校园在时间、空间、主体上的壁垒, 确立整个社会是教育场所, 日常生活处处蕴含教育时机, 人的一生都需要接受教育的理念。在大教育观下, 学校依然是育人的核心枢纽, 但不是唯一主体; 社会不只是生产生活空间, 也是沉浸式大课堂; 公共文化场馆、数字平台、社区、各类社会机构, 都是教育发生的场域。

树立大教育观, 是应对智能化社会的关键。一方面, 它能弥补学校重知识、轻人格, 重应试、轻精神的短板, 给学习者提供多元鲜活的成长体验。另一方面, 学习机会向全体社会成员敞开, 便于成人持续提升自我。这样既能帮助普通人避免被技术边缘化, 也为社会阶层流动打下了基础, 缓解智能化带来的两极分化风险。

2. 充分发挥各类社会公共资源的教育潜能

社会公共资源具有公益、普惠、面向所有人开放、可持续使用的特点, 能提供体验式、沉浸式学习, 契合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需求。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城市公园、历史文化遗址, 是城市最基础的精神教育阵地, 承担着人文传承、审美熏陶、人格滋养的功能, 有助于弥补智能时代精神教育不足的问题。图书馆作为全民阅读空间, 可突破教材局限, 为不同年龄、层次的人群提供人文、科普、艺术读物, 有助于发展自主学习, 对抗算法环境下碎片化阅读带来的认知浅薄。博物馆与历史遗址依托实物与场景, 可让人直观感受文明演进、科技变迁历程, 涵养历史思维与人文底蕴。文化馆与城市公园的艺术展览, 可引导人们感受美、热爱生活。闲暇时间大量增加后, 公共文化资源所提供的非功利精神寄托, 可使人不必依靠劳动谋生, 也能获得充实感, 摆脱空虚娱乐, 建立幸福感。

公共人工智能体验平台、国家开源知识库、公益线上课程、公共数字科普系统, 有助于打破优质教育资源受地域、阶层、校园的限制, 是缩小技术鸿沟的重要抓手。普通民众可借助公共人工智能平台近距离接触人工智能, 理解算法逻辑, 完成基础智能素养启蒙, 避免沦为技术文盲。开源知识库、公益通识课程覆盖人文科技心理等诸多领域, 普通人不用付高昂费用就可更新认知, 缩小和精英群体之间的信息差。公共数字资源还有助于实现差异化育人: 有科创天赋的学习者可借助开源平台动手实践, 普通大众可借此提升人文精神素养, 从而兼顾拔尖人才成长与全民素养提升, 为阶层双向流动筑牢数字基础。

共情能力、社会责任、健全人格, 只能在真实社会场景当中慢慢养成。社区、公益组织、公共服务机构构成社会化学习课堂。社区可依托书屋、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等开展邻里教育、生命教育、公益实践, 培养人的共情能力、责任意识与归属感。各类公益机构可为大众提供志愿服务机会, 引导人们在服务他人、参与公共事务的过程中确认自我价值, 理解共同体的意义。社会化学习有助于培育人的社会性与人文底色, 补足人工智能无法生成的善意与共情, 帮助人在非劳动场景确立自我, 实现完整发展。

当前这些公共资源还处于零散割裂状态, 其教育潜力未得到充分发挥, 也未与正规学校教育有效衔接。这表明, 我国需要完善制度设计, 构建包含学校教育在内、覆盖生命全周期的新型终身教育体系(王竹立, 吴彦茹, 2025), 以整合学校与社会教育资源, 形成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格局。

四、挑战与对策

(一) 核心挑战

1. 对全面智能化前景未有共识

赫拉利在《未来简史》中描绘的社会图景, 建立在高度智能化的前提之上, 但这样的社会图景会不会到来、什么时候到来, 学界没有统一答案, 现实也存在不少制约因素。

一是技术本身的瓶颈。大模型本质上是概率拟合, 不能真正理解现实世界, 存在幻觉、现实场景推理不足、持续学习困难等底层问题。单纯扩

大模型规模不足以解决全部问题,要在复杂的现实世界替代绝大多数人类工作,还需技术的突破。

二是在现实世界落地成本很高。文本图像类任务容易智能化,但户外作业、精细护理、复杂手工、突发现场处置等要实现智能化,成本十分高昂。就算理论上技术可行,出于经济考量,人类也未必会推进,人机协同很长时间内仍是现实的选择。

三是社会制度、伦理与人的主观选择会约束技术走向。技术发展并不完全由技术决定,而是人类社会选择的结果。就算技术可以大规模替代人类劳动,社会仍可以通过法律监管,保留部分人类岗位,约束人工智能的扩张。赫拉利的推演,是在社会不加干预下的风险推演,不是历史必然。社会完全可以依靠制度改变走向。

由此,我们需要区分两种状态:局部渐进智能化和彻底的社会全面智能化。人机深度协同的局部智能化已实实在在发生,人工智能渗入各个领域,重塑岗位内涵,重构劳动结构。而以通用人工智能为标志的全面智能化能不能实现、何时实现还没定论。乐观者认为接近人类能力的通用人工智能十年内可能出现;怀疑者认为真正等同人类全部能力的人工智能或许永远无法诞生;多数研究者认为实现通用人工智能可能需数十年,完全替代人类工作或许要百年以上。

但即便完全智能化时代十分遥远,标准化岗位改造、技能贬值、部分群体被动闲暇、价值焦虑、数字鸿沟在当下已经发生。本文提出教育目标重构、完整教育、大教育观、终身教育,不是面向遥远未来的空想,而是立足当下、近中期可以逐步落实的现实方案。

2. 观念与体制机制转变滞后

智能技术普及后,学生容易困在算法茧房中,独立思考和价值判断能力弱化。学校智慧教育还没有实现技术和教学深度融合。智能化改造多把板书换成多媒体、线上题库,本质依旧是填鸭教学,课堂模式、育人逻辑没有根本变化。智能技术有潜力促进教育均衡发展,但新的数字鸿沟同步显现。城乡、家校之间差距拉大,优质智能教育资源向优势家庭倾斜,弱势群体依靠教育向上流动的难度加大。教师队伍能力和智能化教育需求不相匹配。不少教师还难以从知识传授者转变为学生的成长

引导者、思维培育者和技术赋能者。

教育评价体系改革阻力重重。分数、升学率等核心考核标尺,与智能时代综合素养的育人目标冲突。应试教育培养出来的人,很容易被机器替代,并陷入生存价值迷茫。

(二) 对策与建议

人工智能带来的劳动结构、价值体系、阶层形态等系统性变革,要求教育同步转型。改革可分两大板块:一是教育系统的内部改革;二是外部社会制度的协同配套,二者缺一不可。

1. 教育系统内部改革

1) 学校教育

学校教育首先要摆脱工业化教育惯性,调整课程内容、育人模式、评价机制,从培养“可被替代的劳动者”转向培养“完整、不可替代的人”。

课程建设和教学要降低机械知识记忆、应试刷题、标准化职业训练的占比,增加人文素养、生命教育、审美教育和创造教育;大力培育人工智能难以涉及的核心素养,如独立思考、批判性思维、创新实践能力、生命意义建构;普及人工智能通识知识,让学生懂技术、懂风险、善使用,不被技术支配,从源头消除技术文盲,缩小认知鸿沟。

人才培养应兼顾精英与大众的需求。这包括面向有科学兴趣、禀赋突出的学生,开辟人工智能研发、系统运维、技术治理的加速培养通道,以兴趣和真实能力为选拔标准,防止技术能力变成世代承袭的特权;面向大多数普通学生,培育多元价值观念、健全人格、感受幸福的能力、经营闲暇的能力,帮助他们拥有完整的生命品质。两条路径不能互相隔绝。分层是能力志向的差异,不是身份的划分。

建立多元综合评价体系,把创造力、品格修养、共情能力、自主学习、社会实践成果纳入评价维度,降低标准化应试成绩的权重,引导多元成才,为阶层流动打下基础。

2) 社会化学习

长期以来,博物馆学习、社会实践、公益服务、线上自主学习等社会化学习得不到认可,这是社会教育资源难以落地的关键障碍。

智能化时代,建立社会化学习学分认证制度,打通校内校外评价壁垒显得更加迫切。这包括:将公共文化体验、数字素养学习、社区公益实践、自

主终身学习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面向成人设立终身学习积分制度,建立公共素养档案。让社会化学习不再只是课外活动,而是正式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笔者曾提出构建以终身学习能力、创新实践能力、人机协作能力为统一标尺,以终身学习能力层级测评、新型学分银行为双支柱,形成“1套核心标尺+2大评价支柱+3层运行架构+4项保障机制+5项技术支撑”的新型终身教育评价体系及可落地的实操方案,为破解终身教育“落地难、抓手少、缺标准、认可低”困境提供支撑,助力学习型社会建设与教育强国战略推进(王竹立等,2026)。

2. 外部社会制度协同配套

上述学校与终身教育体系改革,只能缓解部分风险。智能化带来的结构性矛盾,单靠教育无法完全化解,还需社会制度的协同。教育可以改变人、引导价值,但单凭教育化解不了智能化带来的全部结构性社会矛盾。“无用阶级”风险、劳动价值消解,根源同时存在于分配制度、社会保障与财富结构中。教育改革必须和社会制度改革协同推进。

传统分配主要依据劳动贡献、劳动时长。智能时代不少人不再直接参与核心生产劳动,依靠劳动获取财富的模式逐步失灵。社会要探索技术红利普惠共享机制,让普通民众同样分享生产力提升带来的收益,不因丢掉工作岗位而失去物质保障,从物质层面缓解阶层对立根源。劳动时间缩短,闲暇增多后,社会不仅要保障人们的衣食住行,还要提供配套公共文化、终身学习、精神服务资源,避免大量空闲时间被低俗娱乐裹挟,保障普通人的精神健康。社会也需搭建技术发展的社会制衡机制,防止数据、算法成为少数人固化阶层的工具,形成“教育树人、制度兜底、技术向善”协同治理格局。

面对智能化浪潮,社会容易滑向技术乐观主义和技术悲观主义两种极端,二者都不利于教育良性发展。技术乐观主义迷信技术万能,认为技术可以化解一切社会问题。教育过度偏向技术技能训练,延续功利化思路,加剧人的工具化。技术悲观主义全盘接纳赫拉利偏悲观的预判,认定智能化必然带来人的价值丧失、社会撕裂,对教育变革丧失信心,抗拒技术、固守旧模式,从而加速个体被社会淘汰。由此,我们应秉持辩证理性的中间立场,正视人工

智能对劳动结构、价值体系带来的冲击,看清阶层分化、精神虚无等现实风险,同时拒绝历史宿命论,相信教育拥有塑造人、缓冲技术弊端、重建生命价值的力量。技术本身无所谓善恶,它带来怎样的社会后果,取决于制度设计、教育引导和价值规范。教育的使命,就是放大技术造福人的一面,消除技术异化社会的负面影响,在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之间寻找平衡。

五、结语

社会全面智能化正在撼动工业时代延续下来的劳动价值逻辑与阶层结构。以知识灌输、应试竞争、职业训练为核心的“谋生教育”,只能培养易被人工智能替代的劳动能力,很难培养人工智能无法替代的原创思维、同理共情、生命意义感知等能力,难以化解智能化带来的人的价值危机。

智能时代的教育必须完成根本性转向,从谋生教育走向人的完整、全面发展教育。这包括:不再把培养劳动者当作唯一目标,教育同时需要承担塑造人格、建构价值、守护幸福感、缓和阶层撕裂的综合使命,帮助个体应对被动闲暇困境;开展兼顾少数科技精英培养与面向大众的人文普惠教育,推动阶层之间的流动;践行大教育观,打破校园围墙限制,充分激活公共文化、数字资源、社会场景的育人潜力,依靠制度衔接、社会化认证,构建家校社协同终身育人体系;利益分配、社会保障、技术监管等制度协同发力;理性看待技术利弊,主动化解智能化带来的社会风险,推动构建各类主体和谐共生的智能社会。

〔参考文献〕

- [1] Autor, D., & Salomons, A. (2019). Automation and new tasks: How technology displaces and reinstates labor[R]. NBER Working Paper No. 25684. Cambridg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https://www.nber.org/papers/w25684.pdf>.
- [2] 鲍春雷(2026). 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与应对 [EB/OL]. (2026-04-03) [2026-09-06]. <https://www.calss.net.cn/p1/zjsd/20260403/45130.html>.
- [3] 蔡昉(2025). 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保障: 理念更新与制度建设 [J]. 社会保障评论, 9(5): 1-16.
- [4] 陈斌开, 张梓润, 夏俊杰等(2026). 人工智能、经济增长与财富分配 [J]. 经济学(季刊), (3): 668-691.
- [5] 陈青(2026). 人工智能对就业的新一轮冲击调查 [EB/OL]. [2026-09-06]. <http://www.zj.xinhuanet.com/20260721/4e55e7f6ab46425c>

ab1b9cd611e7ebe6/c.html.

[6] 胡开明, 闫慧, 祝振媛(2026). 代际人工智能鸿沟测度方法: 量表开发与应用实践 [J]. 图书情报知识, (3): 156-168.

[7] IMF(2025). AI adoption and inequality[R]. IMF Working Paper No. WP/25/068. Washington D. C.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https://www.elibrary.imf.org/downloadpdf/view/journals/001/2025/068/article-A000-en.pdf>. DOI: 10.5089/9798229006828.001.

[8]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2016). 我们孙辈的经济可能性 [M]//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劝说集. 李井奎,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14.

[9] 刘红英, 黄旭, 朱琪(2024). 人工智能、技能培训与劳动者工资差距 [J].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11): 103-116.

[10] 齐天骄(2026). 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冲击与福利国家的政策调整 [J]. 社会保障评论, 10(3): 23-39.

[11] 王竹立, 吴彦茹(2025). 如何构建数智时代的新型终身教育体系——兼论新质教育和新质人才培养 [J].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37(3): 61-68, 77.

[12] 王竹立, 谢韵佳(2026). 基于第一性原理的新型终身教育评价体系创建 [J]. 两岸终身教育, (4): 1-8.

[13] World Bank(2026).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26: The promis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R/OL].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26. <https://www.worldbank.org/en/publication/wdr2026>. DOI: 10.1596/978-1-4648-2199-8.

[14] 喻国明, 滕文强(2024). 发展可解释的人工智能: 韧性视域下 AIGC 时代数字不平等的社会性构建与治理路径 [J]. 当代传播, 2024(4): 10-14.

[15] 喻国明, 苏健威(2023). 生成式人工智能浪潮下的传播革命与媒介生态——从 ChatGPT 到全面智能化时代的未来 [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5): 81-90.

[16] 尤瓦尔·赫拉利(2017). 未来简史: 从智人到智神 [M]. 林俊宏,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17] 张丹丹, 于航, 李力行等(2025). 中国人工智能技术暴露度的测算及其对劳动需求的影响——基于大语言模型的新证据 [J]. 管理世界, (7): 59-72, 4.

[18] 钟祥铭, 方兴东(2022). 智能鸿沟: 数字鸿沟范式转变 [J]. 现代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4): 133-142.

(编辑: 魏志慧)

What Should Education Do in the Era of Comprehensive Social Intelligence?

WANG Zhuli, WU Yanru, WANG Yongjun, YANG Liqin & WANG Yongping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Taiyuan 030031, China)

Abstract: Comprehensive social intelligence is gradually evolving from conceptual vision into reality. By clarifying the connotation and prac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omprehensive social intelligence,” this paper reviews research progress on social risks brought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t identifies key limitations in existing scholarship: most studies concentrate on economic-social dimensions, while systematic responses from an educational perspective remain insufficient. On this basis, the paper reflects on the practical constraints of traditional education systems amid the wav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t re-examines the missions that education ought to undertake in the AI era. This study argues that education should break away from the logic of “survival-oriented livelihood priority” and shift toward fostering holistic human development. Education should function to narrow technological divides, mitigate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guide individuals to properly cope with passive leisure and time-related dilemmas. A broad conception of education is advocated, which fully taps the educational value of diverse public social resources. This paper further analyzes potential obstacles in educational transformation, distinguishes internal reforms within the education system from external institutional coordination, and proposes feasible countermeasures regarding curriculum and assessment reform,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zed learning system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supporting social mechanisms. It provides theoretical references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education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Key words: comprehensive social intelligence; educational mission; human polarization; social risk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ublic educational resources